

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

——以《劳动界》为中心的研究

杨宏雨 吴昀潇

内容提要 《劳动界》是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面向劳动大众宣传社会主义、启发劳动者觉悟的刊物。从《劳动界》可以看出,建党时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已经有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劳动是“世界上第一桩神圣事业”,“没有劳动,便没有现在的社会”;“尊重劳动”,“无工无食”;社会主义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是我们劳工的责任”;劳动者要觉悟,要联合起来,向资本家争取“人的生活”,进而实现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劳动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五四前后兴起的“劳工神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劳工神圣 《劳动界》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杨宏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 200433

吴昀潇,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研究生 200433

一、“劳工神圣”思潮的兴起与《劳动界》的创办

什么是思潮,梁启超有一段绝妙的解释:“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20世纪初年,中国劳动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与“五四”前后“劳工神圣”思潮的兴起密切相连的。

最早在中国提出“劳工神圣”这一口号的是蔡元培^[2]。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为庆祝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结束与协约国的胜利,在北京天安门发表演讲。他有感于中国在欧洲战场无一兵一卒,是十多万华工用他们的生命和汗水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大声地喊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3]蔡元培喊出的“劳工神圣”的口号过去被当作十月革命影响中国的例证,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一认识是背离事实的。蔡元培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4],是他把中国传统的“民贵说”、“民本”思想发展到“劳工神圣”的思想基础^[5]。

1919年11月底,同样是为了庆祝协约国的战胜,李大钊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

谷秀青

内容提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为南京国民政府、革命根据地及日伪政权等多个政权的
同时并存,使得当时教科书的编写始终处于“多样化”状态。而由于政治立场与史观的差异,三
个政权编写的教科书在辛亥革命的记载、评价、认识上也各有侧重、互有不同,成为形塑当时民
众辛亥记忆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教科书 辛亥革命

谷秀青,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430074

教育是型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教科书则是实现这一型塑功能的主要载体,担负着向受教育者“规范”各种知识、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作用。而辛亥革命作为近代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在其发生后不久即被引入教科书中,成为实施现代教育型塑的重要元素。但受政局变动、时事需要及学术研究的影响,各时段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的书写常有不同,甚而差别极大,而这又对各时段民众(特别是受教育者群体)辛亥革命集体记忆的构建起到了直接的影响。本文即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对辛亥革命的记载为分析对象,试图解析此阶段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观。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在教育上,推行实施“三民主义

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尽管与此前国民党主张的“党化教育”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的,都是“把(国民)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经里去”^[1],奉行的是教育泛意识形态化。

与此相应,在教科书编撰上,南京国民政府仍延续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制,即各出版社或个人编辑的教科书要提交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核定后,才能出版使用。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学校所用之教科图书,未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审定或已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2]依据这一审定原则,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进一步制定了《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加以具体化。该标准涉及教材精神、实质、组织、文字及形式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教材精神的首条就是要“适合党义”^[3]。由此可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百年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研究”(1011228B)的阶段性成果。

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

盛邦和

内容提要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早期改良派开展了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他们了解世界大势,认识中国国情,寻找落后根源,探索前进道路,提出立工商、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的热切要求,显示中国现代化先觉者最初的思想历程。

关键词 工商立国 君民不隔 体用兼备

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0433

19 世纪 60 年代后,一批与洋务运动伴行的思想家活跃于言论界,他们被称为中国早期改良派。他们大都亲历洋务,将实践所知,形成论著。其中的一些人以官派、留学及私人旅行等形式渡洋考察,将一路见闻,形成日志笔记。

他们留下的种种言说,超越一般洋务官僚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准,体现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追求。他们发起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比较运动^[1],实地考察,识其泾渭,探知中国所异于西方,其要者为以下数端:是男耕女织,而非经商求富,贸易立国;是君临天下,而非举“贤”为“公”,宪政治国;是拘泥虚文,而非经世匡时,讲求实学;是“遗体求用”,而非“体用兼备”、“本末具有”。由此,立工商、开市场、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成为他们的吁求要素。

一、“农国”与“商国”

“泰西风俗,工商立国”,而中国“重农抑商”;西

方扶掖商人、“保护商会”,而中国“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中国早期改良派对比中西,要求走出传统,“大兴商务”、“富国强兵”。黄仁宇说: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国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再有“商业的系统”,“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2]。洋务运动堪为中国“现代”运动的波澜初兴,早期改良派从促进工商起步,要让中国步入“现代的系统”。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新政论议》中说:“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中国物殷民富,最宜于商。”由此建议,“新政立,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3]马建忠 1876 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1880 年回国。他上李鸿章书云“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4]陈炽则提出,国家一旦推行商政,当在组织上作具体的落实,转农国为商国。他说:“宜仿泰西各国,增设商部,管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税四司,各任其事。”^[5]郑观应强调,倡导洋务,目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资助,批准号:2009JJD770016。

清末民初英国在中国 租借地威海卫的乡村管理

刘本森

内容提要 英国租借威海卫后,采取“维持旧制”的乡村管理方式,并将乡绅纳入正规行政管理序列、赋予民主法治内涵,为威海卫的乡村管理注入了近代因素。总董、村董、长老是威海卫乡村的管理者,他们在农村中沟通上下、办理基层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英国人通过规范绅权、表彰楷模、劝勉惩戒对乡绅进行管理,有效地经营乡村,收到了“鸡犬无惊”之效。

关键词 英国 威海卫 租借地 总董 乡村管理

刘本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200241

1898年7月1日,奕劻、廖寿恒与窦纳乐分别代表中英政府签署《租威海卫专条》,将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租给英国^[1],自此,英国开始了在威海卫长达32年的统治。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与旅顺隔海相望,扼守渤海湾,英国租占威海卫的初衷在于抵抗俄国在中国北方的扩张、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名誉。为了得到德国支持,英国还公开承诺不在山东修筑铁路^[2]。当时英国在威海卫的“直接统治区域大概是315个村庄”^[3]。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英租时期威海卫没有能够取得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成为英国舰队的基地,而是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依旧基本保持着农村的面貌。

目前学界对英国在威海卫租借地的乡村管理研究并不充分。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制度层面的探讨。其中,王昌民对威海卫的历任总董有全面的介绍^[4];章再彬对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演进进行了梳理^[5]。此外,还有一批从管理学角度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分析的硕士论文^[6],但这些

论文对史实的发掘和梳理不足。本文拟利用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资料,分析英国人在威海卫租借地的乡村管理与社会控制,以增进对英国殖民政策的理解和对地方社会生态的把握。

一、英国人的制度设置

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后,因为准备不充分,而且中英尚未进行联合勘界,所以并未立即对威海卫进行管理。直到1900年春勘界完成,英国才于1901年7月制定《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7],正式开始对威海卫的统治。

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是贸易”^[8],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并扩大在远东已经确立的商业优势。租占威海卫之后,英国发现其“战略价值几乎为零”,而且也“绝对无任何经济价值”^[9]。所以《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出台后,威海卫很快被英国遗忘了。英国采取了以“最小的代价治理威海卫”的殖民方法,殖民政府中“所有欧洲文职人员编制不超过12

清政府立宪化除满汉畛域 策略确立过程之考察

潘 崇

内容提要 清季满汉畛域,主要指满、汉族群间的权利差异,是革命派宣传革命排满的主要依据之一。清政府最终确立通过立宪化除满汉畛域以消弭革命的策略,然该策略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1905年9月24日吴樾暗杀考察政治大臣,引发清政府关于立宪化除满汉畛域论说的兴起。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后极力宣扬立宪可以化除满汉畛域、消弭革命,推动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化除满汉畛域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目标之一得到确认。然而该谕旨颁布后,清政府随即开始中央以及地方的官制改革,对化除满汉畛域似乎无暇顾及。直到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的发生,清政府意识到革命派非此前内乱可比,需要在武力镇压的同时筹划治本之策,最终确立起立宪化除满汉畛域以消弭革命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 满汉畛域 立宪 清政府 革命派

潘 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100006

学界对清末十年清政府化除满汉畛域的思想及实践多有关注,然对清政府通过立宪化除满汉畛域以消弭革命基本策略的确立过程缺乏考察。实际上,该策略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化的过程,系统梳理这一过程,对于我们认识清季革命派与清政府的对立态势尤其是双方压制对方的策略取向及相互影响大有裨益。

一、吴樾炸弹案与清政府立宪化除满汉畛域论说的兴起

1905年之前,少数颇有胆识的政府官员即提出化除满汉畛域之论,论及化除满汉畛域的原因及具

体策略。然而毫无例外,这些论说皆是在专制政体下对满汉关系细枝末节的修补,且只零星可见。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尽管谕旨未明言此次考察的重点在于各国宪政,揆诸清廷对遣使谕旨的目标预设,其主要目标正是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国内外“金谓(清政府)将举行宪政”^①。遣使谕旨的颁布以及接续的系列事件引发了清政府与革命派的正面交锋,清政府内部亦因此初步掀起通过立宪化除满汉畛域的讨论。

遣使谕旨颁布不久,同盟会8月20日在东京成立,将“驱除鞑虏”树为国内外革命派共同之旗帜。革命派由于力量集中海外,起初对清政府遣使出洋考

明代带俸武官初探

程彩萍

内容提要 明初创立卫所制,军有定数,官有定额,并世代承袭,以保万世之稳定。然而事与愿违,不久因军功升授,纳粟恩荫等原因,武官数量渐多,出现了官多额少的情况,故定额之外者,列为带俸武官,不得掌管卫事,与见任官相区别。随之,带俸武官群体急剧膨胀,其中有犯罪武职往往被问革为带俸官,成为带俸武官中特殊的部分,其地位更为低下。但带俸武官并非一直为固定之群体,随着军政考选制的成熟与镇戍制的发展,带俸武官得以任事的途径越来越多,两者界限逐渐模糊,而为事带俸官的特殊性却仍然保持,其升转较难,故其往往百般钻营,甚至生事害军。加之诸类带俸武官庞大的数量,给明朝统治带来了系列问题。

关键词 明代 带俸武官 见任官 为事官

程彩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300071

引言

明代以武立国,军事制度有继承亦有创新,《明史·兵志·序》中总结道:“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1]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对卫所进行了一次大的整顿,一郡设所,连郡者设卫,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卫大概有五千六百人,百户下还有总旗、小旗,各卫所军队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率领^[2]。明初,卫所管辖地固定,军士皆有定数,武官设置也有定额。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内府刊定的《诸司职掌》,将卫所制下武官做了明确规定。

都督府: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

事;

留守司:正留守、副留守、指挥同知;

都指挥司:都指挥使二员,都指挥同知二员,都指挥僉事四员;

卫: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僉事四员,卫镇抚二员;

所: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所镇抚二员,百户一十员;

仪卫司:仪卫正一员,仪卫副二员,典仗六员。^[3]

然而在卫所数量增设有有限制的情况下,由于战事未息,加之几次政治事变,功升武官数量剧增,即使太平时期,各种冒功、纳粟、恩荫武官的出现也无不